

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卷

偉·桑巴特著

商 務 印 書 館

27.275

495

1

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卷

[德]偉·桑巴特著
李 季 譯

商[務]書館

1958年·北京

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卷

偉·桑巴特著 李季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總經理

京華印書局印、裝

統一書號4017·2

1936年8月初版

1958年10月重印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20²/₁₆ 插頁4

開本850×1168¹/₃₂

字數447,000

印數1—2,500

定價(9)¥3.20

ZK493/03
()

出版說明

這部“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共有三卷,第一、二兩卷譯本曾于1937年由本館出版,現經原譯者重加修改由本館再版。

本書作者偉·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2)是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的主要研究論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的和理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滾到法西斯主義那邊為壟斷資本集團效勞去了。

桑巴特從1917年以後任職柏林大學經濟系,曾經長期致力於經濟史的研究。“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便是桑巴特研究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成果。另外他還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1924)、“奢侈與資本主義”(Der Luxus und Kapitalismus, 1912)、“三種政治經濟學”(Die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1930)以及為德國法西斯提供“民族優越”反動理論的“哲學的人類學”(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1941)等大量著作出版。

當桑巴特以資產階級的观点和方法從事資本主義研究的時候,無產階級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和理論作出了高度科學性和高度革命性的結論: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桑巴特當然不能達到這個結論,而且是極端仇視這個結論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出版給予無產階級以革命的武器,同時資產階級的學者對這一部偉大的著作就不能不加以注意。按

1469868

照恩格斯所說，桑巴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恩格斯說：“桑巴特对于馬克思主义体系的輪廓，給了一个大体上不錯的叙述。这还是第一次，表示一个德国教授能够大体上从馬克思的著作看出馬克思真正說过什么，并且他說明了，对于馬克思主义体系的批判，不能是反駁——‘政治野心家才会这样干’——而只能是进一步的發展。如人所知，桑巴特也研究我們現在的論題”。（“資本論”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三卷，第 1168—1169 頁）。恩格斯所說的这个論題正是关于資本主义命运的研究，而桑巴特是从維護資本主义的反动立場来进行研究的。

桑巴特自己在講到本書与馬克思主义經濟学的关系时，一方面把自己扮成与反动的、妄想一古腦兒罵倒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学者有所不同，如他在本書中就假惺惺地說过：“我……無所保留地贊美他（即馬克思——編者注）是資本主义的理論家和史学家。”又說：“凡我的著作中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是受了馬克思的精神之賜”；另一方面他又像一切資產階級的学者一样，对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采取了露骨的仇恨，如他自己所宣称的本書与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在于“破除馬克思的魔术”，又說：“我……严格否認他（即馬克思——編者注）的世界观，因此也严格否認現在总括并評价为‘馬克思主义’的一切东西。”这就是桑巴特的本来面目。

我們現在將“現代資本主义”一書重新發排出版，是为了帮助我国的研究工作者認清資產階級学者的反动本質，批判和肃清外国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在我国的影响，以达到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至于本書所提供的有关欧洲經濟史的一些資料，对我国的經濟史研究工作者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譯者序言

歐洲各國關於經濟史的著作雖應有盡有，但以全歐現代經濟生活為對象而綜合敘述的，始終當推德國偉·桑巴特的“現代資本主義”為巨擘。是書規模的宏大、取材的豐富、敘述的周詳、條理的明晰，在在超人一等。最初出版遠在 1902 年，共二卷。作者旋將是書改編，拋棄原有的材料至十分之九，增加大量新材料，於 1916 年再版，面目遂煥然一新。至 1928 年又刊布第三卷，全書至此才告完竣，共六巨冊。

關於書的內容這裡不必提及，惟對於作者的立場應當說明一下。

桑巴特是德國資產階級學者，他的立論即從這個階級的观点出發，這完全是自然的。我們知道，近幾十年來資產階級的學者，從社會科學家到自然科學家，因階級利害的關係，多躲在唯心論的神秘窟中，桑氏更不是例外，所以他說：

“資本主義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發生出來的。產生新國家、新宗教、新科學和新技术的同一精神，又產生新的經濟生活。”（見“現代資本主義”原文第一卷一冊 327 頁）“凡予自身以一種適合的形態，並因此創造經濟組織的，是精神——這是本書的根本思想。”（見原書同卷同冊 25 頁）

桑巴特認精神為萬物之母，能創造一切，但這種精神由何而來、因何發生，他就不往下追究了。著經濟史的人會溜過真理之門，採取如此神秘而淺薄的觀點，若不從階級的利害與成見着眼，真令人無從索解。

資產階級學者著經濟史，採取唯心論的觀點，極力擁護資本主義，這正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絲毫不足為怪，所可怪的是桑巴特自命為馬克思的繼承者，而他的“現代資本主義”據說是一種完成“資本論”的著作，所以他在第三卷的序言中說：

“末了，我對於卡·馬克思及其著作的關係，還要說幾句話，自我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出版後，在外表上顯出我對這個天才通常是站在一種原則的對抗上，那我這種說明尤有必要。其實談不到這樣的對抗，我還可以斷言：本書不過是馬克思的著作的一個續篇，在某種意義上並且是他的著作的完成。我雖嚴格否認他的世界觀，因此也嚴格否認現在總括並評價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東西，但我卻無所保留地讚美他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和史學家……凡我的著作中稍微好一點的東西，都是受了馬克思的精神之賜。”（見原書三卷序言 18 至 19 頁）

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唯心論者既已嚴格否認馬克思的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他的“現代資本主義”竟能作為“資本論”的“續篇”，並且是“資本論”的完成，這種邏輯誠非我們常人所能領略。不過再聽桑巴特說下去，也就不難明白他的真意所在了：

“人們如果不用比喻，拿一句話指出本書對馬克思的著作的關係，那也許可以說，書中將破除馬克思的魔術。”（見原書三卷序言 22 頁）

譯者從前留學德國，親見經濟學的教授們在教課時照例總要將馬克思痛罵一頓，桑巴特教授對於馬克思卻以感恩圖報的形式來“完成”他的“資本論”，這種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手段，的確比一般教授的一味痛罵巧妙得多了！

可是譯者上面的說法並非完全否定“現代資本主義”的價值，用意只在指出鼎鼎大名和他學的桑巴特為階級利害和成見所限，

在这部耗费大半生精力的巨著中，表现出一个何等大的根本缺点；他为着替资本主义辩护，竟不惜硬拉马克思做同志、“资本论”做先驱，他的议论是何等令人难于置信！不过经济史毕竟是以描写事实为骨干，我们如果把“现代资本主义”看做经济史料，它当然不失为一部具有相当价值的书，译者愿意担任此项翻译工作，理由全在于此。

其次，关于翻译本身，也有几点要声明的，今特分述如下：

一、是书每篇或每章之首多列举各种参考书，或作成书籍解题，少则数行或数十行，多则数十页不等（如二卷第5总篇所附的书籍解题多至34页，字数当在两万以上），这在容易取得参考书的西洋各国也许有必要，但译成中文，徒占篇幅，殊少意义，故一概从略。

二、是书一二两卷中用小注说明或征引的文字实在太多（作者在序言中也自承“引用文的分量常是繁多”），至少是对于我们没有必要，故多略去不译。但关系重要之处，或特别足资我们参考之处，仍一律译出，如关于殖民地及农业等章的小注是。不过内中仅讲参考书的节段，仍不予翻译。

三、作者征集材料，十分广博，一句话中往往列举书名数种（多系小注中的），这样固然显出作者“字字有来历”，但译成中文，殊嫌繁琐。故非原文有引用符号之处，对于所标材料的来源，概不翻译。即有这种符号之处，如不重要，也用同样办法，否则仅译出所征引的人名而不兼译其书名，以期简便。对于脚注，除正文的引用符号下必要的人名或书名等等外，也概不译出。

这样对于正文以外的文字删繁就简的结果，第一第二两卷各有十万字左右未经翻译，于是一切较为“繁多”或赘累的东西都除去了。至于第三卷的小注、脚注和书籍解题等等分量极少，使用不

着多所刪削。

四、是書所用的文字多至十餘種，如古拉丁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古德文、古法文、法文、英文、荷蘭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等是。譯者既愧不能通這許多文字，又無其它文字的譯本可資參考（除日文對是書選譯三章，法文譯出第三卷外，歐美各國還沒有譯本），只好直接間接請滬上懂拉丁文的人代庖，結果均不能如願相償。於是直接致書于桑巴特教授，請其代為翻譯，他回信答應叫他的學生代勞，但索價過多，又沒有成功（第一卷中應譯的文字不過三千多字，需二百馬克；每千字幾達國幣百元！）。後來幾經波折，才托留德友人代請一位德國學者譯出。這是本書第一卷早經譯就而遲遲不能付印的唯一原因。

1936年4月28日 譯者識

第二版序言

我于 15 年前刊布“現代資本主義”兩卷，現在又值再版，然就目錄一看，也知道這是一種完全新的著作。原書的材料重新採用的，追不及十分之一，並且這十分之一也大都是在完全新的思想組織中排列出來的。

我所以保持原來的書名（我本不大喜歡這書名），實因要借此表現本書所認定的任務而加以討論的根本問題，仍和從前一樣；即一個根本問題及其所連帶的一批基本思想。此外，新版在內容上也是一種新著作，凡讀此書的人看過第一章，已經可以發覺出來。

關於本書在新的形態中所擔負的任務，我在序言中不加說明；因為一卷三章第三項已經表現過了。在另一方面，我在本書開卷之前，願對讀者說明兩事：即新版比舊版所表現的重要差異之點，和我依照本書科學的特質對它所取的立場，換句話來說，後面這一點就是我在本書中考察一切事物所取的觀點。

* * *

第二版和第一版的差異點主要的如下：

一、新版在材料上擴充的很多。第一版對於歷史的發展只有片斷的記載，此次新版則力求表現歐洲各民族整個經濟發展的圖形。因此我的描寫現在是從喀羅林時代（Karolingerzeit）開始，一直達到現代，對於早期資本主義的時代，尤其是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特別詳盡，然在第一版中幾乎完全沒有涉及。

我在描寫中對於經濟生活取材特多的國家為意大利、法蘭西、大不列顛、瑞士、尼德蘭、德意志和奧地利，至於西班牙、葡萄牙、斯

干的那維亞和俄罗斯，則很少列入我的观察范围之内。然欧洲各国在亞洲、非洲及美洲的諸殖民地，自然也是談到的。

关于各卷材料的分配也和从前不同。现在的第一卷除掉一种概念上基本的緒論外，所描写的为前資本主义的經濟和現代資本主义的历史基础，而第二卷則为早期資本主义时代的經濟生活，这一卷包罗極宏富，并且是完全重新改作的。以后要刊布的第三卷当描写高度資本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完成。

二、第二版在構造上比第一版要复杂得多。这不复是一种“临时的升高記号”，而是一种依据严密对位法处理的交响乐，它会引导讀者潜心于更大的工作和更深的造詣。第一卷第二十章是企圖在那頗为复杂的合唱中給予一种透視。这样处置材料的新方法如果的确会被斥为更笨重而不能一眼望得清楚，那它也足以使本書避去一种輕率而没有思考的批評，这种批評在判断上坚持一个唯一突出之点，而用这是一部“地租論”之类的話来处决全書。

然我最所渴望的，是讀者于研究拙著后，留下一种最深刻的印象，活潑潑地感觉到現代資本主义的起源这句话中包含着極多的問題。自今以后，倘若凡在青草地上建筑的資本主义“發展史”——和革利芝 (Fritz Gerlich) 新近的著作一样——成为不可能，而著名的历史家如柏洛 (U. Below) 对于这些輕率的冒險事業公然許为“一种有用工作的荣誉”一类的事更不可能，那我便特別滿意了。

我以一种自觉的專断，在近来的著作中对于資本主义發展的一方面加以闡揚，人們却根本否認这种方法；使一些聰明的头腦为之震动，使一个作者的理解力为人所怀疑，至于这个作者本来今天認城市地租、明天認貴金屬的生产、后天認犹太人、大后天認奢侈、随后又認战争为促成現代資本主义起源的。他們絲毫沒有察出这

里只涉及部分的研究，殊屬奇怪；他們沒有看出我用這種探照燈方法的目的無非在使讀者的視線每次集中於問題的一方面，因此使他在一個時期內必須深刻地去研究這個部分問題。然我現在却把這一切單獨紡成的綫組織起來，並指出參加現代資本主義構造的，不僅是我曾經表彰的諸勢力，並且還有許多種勢力。

三、第二版在方法上尽可能地避去第一版那種也許是最壞的缺點（這裡附帶說一句，一般批評家無論怎樣嚴厲地批評我，却没有一人發覺這一點必須加以斥責，只有瑪克斯·韋柏在私人的談話中曾說過多次），即理論的和經驗的寫實的考察方法混合起來，這是不能容許的。這個缺點在描寫手工業中特別顯著，但在其它地方也時常出現，殊令人不快。我現在於討論每一單個問題時，即以分離理論的部分與經驗的部分為主要目標，並在全書中嚴格實行這種兩重的考察，關於這一點，我在緒論第三項中還要詳加解釋的。我對於此項更新極為重視，並且希望在方法論的意義上也能因此推進我們的科學。由此又說到我在序言中要討論的第二點：即本書（及其作者）對國民經濟學的各“趨向”、“學派”或“方法”所取的立場。

* * *

現在如果還有人只知道將我們科學的趨向分為“抽象的理論的”和“經驗的歷史的”學派，那沒有辦法，他將和本書對立的。因為他即具有最好的志願，也不能從中指出這兩個“學派”、“趨向”或“方法”之一。然現在遵循新途徑的每種社會科學的著作都是如此。這原不足奇怪，因為自我們看來，“歷史的”和“抽象的”國民經濟學間的對抗已經喪失了一切意義和一切重要性，至少是應當已經喪失一切意義和一切重要性。

現在如果還有一批流於一偏的天才的青年國民經濟學者在我

們的科學中提出一個“理論的”趨向，對着“歷史學派”所代表的研究原則作有意識的對抗，那也不過是由于某種因襲的關係，將“理論”這一概念強行限制在研究完全有定的問題集合體上，這些問題就在保持并發展我們科學中所謂“典型學者”所創立的觀念模型，且借助于這種模型去保持并發展那按照孤立的方法所提出的諸現象（更正確的思想諸過程）的“規律性”。

現在沒有一個人對於這種所謂“理論”——特別是抽象而孤立的方法——的價值比本書的作者看得更高。誰肯勞神去研究，便會發見本書中有無數的節段是應用這種方法的：例如他翻閱一卷第三十三章，那正是完全依照此方法作成的。但現在幻想，向來所稱為國民經濟學的經濟生活的社會科學，其本質與內容在此等抽象論和孤立論之中即告枯竭，或者只認：計劃這樣的構造、得形成此項科學一個獨立考察的部分，我也以為是絕不能允許的。誰相信這樣，那必定稱一個僅計算建築材料載重力等等的人為建築師，其實這種人只是一個部分勞動者。同樣，國民經濟學中僅從事于抽象工作的孤立論者也不過是一個部分勞動者，恰和他的對峙者——僅收集事實的研究者——一樣。只有將這兩種活動聯合起來，才構成科學的國民經濟學整個的成績，現在從我們看來，這完全是自然的；至於“理論”與“經驗”的關係，和同一物的形態與內容一樣，確定這一點，幾乎是很平庸的事。（將第一卷第三十三章和第三十五章對比一下，當特別明了我的意思：第三十三章用孤立的方法，確定貨幣價值與價格間“理論上”存在的“規律性”，而第三十五章則在這個模型中探討一定的歷史時期貴金屬的生產和價格的構成間事實上的關係。）

此外，這種理解已經為早前所謂“歷史”學派的領袖人物所代表；在我們這個世代一切有功于科學的研究者中，它現在也是很流

行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依旧式的划分法被指为或是“理論家”，或是“史学家”；他們恰和后一代一般有才能的代表一样，自然都是“理論家”与“史学家”。本書也正是理論的与历史的。

在我們現代的研究趋向中，“理論的”問題（在其他科学中是如此，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又提在前面，这已經成为此趋向的一个特点；人們直截了当地称为“理論兴趣的复兴”，这是很对的。不过就我們的科学講，不可將“理論”这个名詞限于上面所說那种狭小的意义上。“理論的复兴”对于国民經济学如果是指一种新生命、一种进步，那么，这种进步的代表者的确不是那些毅然高举“抽象的”研究旗帜的意志坚强的人。誰在發展李嘉圖（Ricardo）的公式中（我願再明白說一次，我認此等公式很有用、很有效能，不过总是以知道它的有限的認識价值为前提，尤其要知道，一切抽象論和孤立論只有在依历史特征划分的經济制度的范圍中，才具有一种意义），我郑重地說，誰在研究并發展这种概念模型中看出我們科学的任务，誰就毫無疑义地可以——他如果还具有才能的話——成就有用的工作；不过他不是一个更新者、一个生气勃勃的活动者、一个改革者。毋宁說他是一个模仿者。

人們所称的現代理論的复兴——它和一种哲学的复兴同时出現——完全具有另一种意义。就研究現象的“意义”、研究認識現象的“意义”又較从前为盛一点講，我們的时代是哲学的时代。但就注重概念的分明、材料有系統的处理、尤其是个别知識的綜合又較从前为盛一点講，各个别的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便是理論的。零星研究的結果需要綜合的統一，我在这种需要中真正看出我們現代的特征。

繼續增加的材料压在我們的胸口，使自己覺得这种重負是一种終久不能担負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話，我們便力求从它解脫出

来。但我们如果不愿离开一切“科学”，逃“到遥远的地方去”，除掉给予死材料以生命，借助于有秩序有系统的范畴，使之灵活，让我们争取变成它的主人外，别无它法可以达到目的。我也愿本书能够被视为这样一种精神解放的企图，因此以特别的兴趣来注意概念的构成与系统的构成，由它们的帮助来自由处置许多世代勤勉收集的材料，并使之灵活起来。

在本书(以及相类似、同性质的书)中所表现的科学、仍旧为“国民经济学”，还是宁可称为经济社会学(Wirtschaftssoziologie)，或类似的东西，这种争论是无聊的，因为它是一种空言的争论。正确说起来，此项科学略异于50年前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schule)的代表所称的国民经济学的东西，即那种不受历史的或哲学的重负压迫的学科，为着日常状况去处理日常经济问题(大半是商业问题)，即那种常识的学说，那种从市场去处理市场、由实践去应付实践的“科学”，那种营业学说，又可称为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我现在绝不是要使这样一种日常市场学科极有用的东西陷入疑惑之中。我用坚决的心情所力争的只是：现在这里竟是人类的经济科学。那种商会秘书的国民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的广大范围中，对着数目愈变愈多的技术学说增加一种技术学说。此外，这种以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这只有在历史的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己任的科学变成经济生活的诸科学中一种真正的中心科学。

我们不能承认人们向来所称为国民经济学的科学要被投到它在50年前所达到的地位上去，因为德国的大师——无论是所谓“历史学派”，或所谓社会主义的流派——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工作，他们的主要结果对于我们应作为一种不可丧失的财富。

我的著作不供某个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政策的党派之用，

絲毫用不着郑重声明出来。这是自然的。在近几十年来的德国，人們对于科学代表的区分，也已經开始不以他們的科学方法和成就为根据，而以他們的政治意見为根据，这是現代一种不良的征候，令人想起美国的状况。实际利益的代表这样做，原不算很坏，因为他們这样的人用不着知道科学是什么。但学术界也陷入这种不正当的途徑中，便是最严重的事。我的意思是，只有从屬的和内心不科学的人才能够想到評判一个科学的人物，和对国会的选举一样，要問他的思想是“接近企業家”，还是“接近工人”，如此等等。

* * *

我对于支配本書的諸种意見所标举的倘不完备，也不願用一句話再去表明我对着历史研究和史学家所采取的立場。

在專業的史学家集团內，認本書在第一版的編制为一部拙劣而錯誤的書，这就算是解决一切了。这些史学家在否定的批評上，有一大部分是对的。第一版各处包含一些恶劣的錯誤，必定使他們挾着自己完全凶猛而激烈的方法，加以反对与拒絕，因为他們是習于徹底綿密的方式，并在一个严格的学派中發育出来的。我希望第一版那些缺憾的大部分在第二版中是被删除了。

但我不能承認，一般史学家否定的批評的全部都是对的。他們倘若避去一种滿怀敌意的批評論調，对于事实当較有益，不过我責备許多公开批評我的書的史学家之处，并不在这种論調上。学生要同意保存先生們曾經应用的論調，正是义不容辞。受博士考試的青年学生当作一个經濟史問題的論文时，常在他的小册子中用大段的文字来反对我，并宣言他和我的意見“自然”不願發生絲毫关系，这是某些大学良好的学風，我見了，几乎至为高兴。（然我这些意見对于他草拟論文，常是有用的。）

但这究竟不是十分重要的。較为重要的是，許多史学家又認

我的書中所用的历史表現的方法——即我的方法中的結構論與一般論——為不對。我對於這種見解願以下列的說法為權衡：對历史的世界提出問題，顯然有兩種可能性，或是問：曾發生什麼事，或是問：曾重演什麼事。人們就事件的唯一性看，可稱前者為特殊历史的問題，就事件的重演看，可稱後者為社會學的問題：總說一句，它們都是對的，一切历史的編纂都可利用這兩個提法。按照所考察的對象，得時而注重這一提法，時而注重那一提法。傳記和狀況史將表現最外表的對抗。這兩個提法在經濟史中也占有地位。這裡也沒有“非此即彼”，只有一個“不僅……並且”。但历史的和社會學的研究在發見特點的特殊理解中，不僅需要一種有用的經濟史作為補充，並且恰恰需要它作為基礎，這是必須鄭重聲明的。一經確定那些經濟現象是一般的，這就是說，重演的，才能够确切宣布我們所考察的問題集合體的特點是在那裡。

現在本書的特點就在對於研究經濟諸現象一般性的問題一直擴充到可以達到的最外部的界限。這種界限是由南歐和西歐的民族——他們自民族遷徙以來，就是歐洲历史的代表者——所構成的文化圈。單就這一點來考察，上面的問題又是一個特殊历史的問題：只有一部“現代資本主義”史，沒有一部一般的資本主義史。但在这个曾經確定的文化圈內，各民族的每一特點並沒有顧及，而且要問：那些引導現代資本主義起源的經濟現象是歐洲一切民族所共有的？我不僅認這個提法為完全正確，並且和我曾經說過的——發見經濟發展中這些普遍的歐洲的特點，是探討較小的集團經濟的運命而希望取得豐富收獲的必要的前提。

我的著作並不排除特殊的研究，它可以涉及整個的國家，也可以涉及單個的鄉村；反之，它才使它們產生良好的結果。要在人們知道歐洲經濟史是什麼以後，才可以著德意志、法蘭西、英吉利等